

■财富故事 | Fortune Story |

# 过年回家,用钱不那么大方了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记者的老家在江汉平原的一个农村里,村里人以积累财富的两大主要方式:一是去石家庄等北方城市从事工程承包、房屋装修等工作。二是在广州或江苏盛泽等南方地区从事服装批发、布料加工等工作。往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些在外务工和做生意的老乡,回家时那叫一个阔绰,把钱似乎不当钱似的。如今,经济下滑,很多传统的生意都不好做了,回到家乡的亲戚朋友,腰包明显没有了往年的“豪气”。

今年生意太不好做了,辛辛苦苦一整年,不仅没赚到一分钱,还亏了十多万万的档口费。”提起过去这一年,在广州做服装批发生意的小汪一脸沮丧。2015年,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一方面,来他这里进货的全国各地客户明显减少,大家都说生意清淡了很多,老百姓消费动力趋弱,网上购买服装成为年轻人的共同选择。因为前几年尝到了做

服装生意确实是发财致富的一条好途径,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同乡跑到广州从事服装批发生意,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大家互相杀价,在一片红海里厮杀,小汪越来越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兴的电子商务又超出了他的能力范畴。这次回家过年,他除了给父母亲买点礼物,亲戚朋友几乎都没买,回家也不想打麻将了。要是在往年,小汪开着他的奥迪车煞是风光,给亲戚朋友用钱也是大方得很,在县城吃饭几乎都是他买单,送礼金比一般人都要送得多一些,这点钱相比小汪当年动辄百万的收入,实在算不了啥。但如今,小汪因为一年还亏了十多万,回到老家用起钱来就要“小心翼翼”起来,哪些是该省的?哪些是可以少花费点的?这些都要在心里盘算一番。

记者的一位初中同学,前几年在江苏盛泽做布匹生意,一年赚个百八十万不是问题,但这几

年经济下滑,出口萎缩,纺织行业普遍不景气,2015年这位同学也没赚到钱,算下人力成本,勉强保本,今年回老家,都老实实在住家里的老宅了,以前可是在县里面的宾馆住的。这位生意人说,布匹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销量萎缩,而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加上布匹加工是高污染行业,当地政府也会进行治理整顿,如今布匹生意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服装行业整体不好做,对布匹的需求也在下降。尤其是外面,以前有很多外国的客户来这里进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未来到底干什么?是继续坚守等待转机,还是开辟新的商机?成为这些生意人共同的难题。

与此同时,家乡很多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大批前往石家庄等北方城市,从事工程承包和房屋装修等工作,这些人也成为家乡最早富裕起来的人群之一。那个时候,村里人成批地往石家庄等北方城市涌,有的甚至一家老小,包括

亲戚朋友都全部去了,房屋装修的活根本干不完,一些做工程承包的老乡,更是早早地就发了财,回来老家盖了房子买了车。过年回家的时候,个个脸上喜气洋溢,回味的收获,说话的音量都要比如今大很多。现在,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大下滑,在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可以找到的装修活越来越少了,有时候还要跑到临近的保定等其他城市去找活干,价钱也越来越便宜。记者的几个亲戚都在石家庄从事装修工作多年,往年回老家都是大包小包提着回家,给父母的钱一次一两千算不上是大数字。很多赚了钱的老乡回家后除了吃吃喝喝,就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打麻将,随便输赢个两三千都压根儿没怎么放在心上,如今,村里人打麻将可谓门可罗雀,打麻将的人明显少了,集市上买衣服购置年货时也没有以往那样“干脆”了。很多家庭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还要为子女结婚准备一笔新房的首付款,在

装修生意大幅下滑的当下,老乡们脸上经常挂着愁容。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在传统经济增长式微的背景下,对于农民来说,固有的挣钱方式越来越遭到挑战,而新兴经济暂时在农村不会兴起,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决定了占据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其实也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绝不仅仅是工业、金融、服务业的事情,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人恐怕都难以抽身这场变革之外。转型期会有阵痛,也会有机遇,记者老家的一部分农民,这几年在自己家经营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就比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收入要高,这也带动了部分农民工“回流”的农村,去从事农产品和农业服务业相关的行业。比如老家有一个很大的天然湖泊,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目前正在规划成农家乐、农村旅游休闲、体验式农业种植等一条龙产业链,这也带动了一批农民开拓出新的致富渠道。

■客官别急 | Easy Investment |

## 权威就是信赖和无私



朱凯

近日看到两段文字,一个是有关农村教育现状调研的《中国青年报》刊载文章,一个是新浪微博上朋友的发言,有关自己学生时代“外感悟”的内容,我竟由此联想到领导权威如何树立的话题。

其实,上述联想来自于“孩子王”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在学校里,尤其在学生面前,教师无疑就是领导。教师的权威能否很好树立,决定了学生对这位教师所授课程的认可接纳程度,进而可能影响其学习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的养成。

那篇报纸刊载文章里,作者通过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研发现,西部农村初中生厌学情绪十分严重,“穷教师”的现身说法不仅没有激发孩子努力学习,反而招致讥笑嘲弄。教师权威的严重缺失,使农村教育的恶性循环日益畸形,那些“隐性失学”的孩子或成为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微博朋友发言则说:回想起中小学成绩好的科目,都是老师喜欢我,我喜欢老师。到头来学习的动力,很大程度是为了讨老师喜欢。我越好好学,老师越喜欢;老师越喜欢,我就越好好学。那么,有没有因为老师批评而好好学习呢?就我记忆而言,没有。所以,多夸奖学生是有道理的。”

这两段文字的共同点在于,教师“仓廩实”,学生才能“知礼节”。教师的权威,不是靠批评和“凶恶”,而是要靠他自身的丰满、财富与魅力。在这里,“半润”指的是支撑教师言行背后的一种精神;“财富”除了物质上的之外,还有知识结构、社会阅历与人际关系;“魅力”则指的是所有能影响学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其实,领导也是如此。

近20年来我国教师的权威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解决存在的某些瓶颈?

我本人在19年前从教,尔后在7年后离开,不算短也不算长的几年中学教师生涯,使得我在这篇小文章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回想当年,22岁左右大学毕业时的青涩,有满腔热情,但缺少经验。随着时光流逝,随着挫折感的快速增加以及收入的缓慢增加,我也杂念渐起,萌生了考研转行的想法。

在7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中,我是失败的。寒暑假的闲暇时间虽令人羡慕,但财富欠缺使我有外出旅游的实力,结果只能在漫长的假期中玩电脑游戏度日,也因此丧失了阅历增长的机会。

也有成功的教师。他们的幽默风趣中包含着慈母的“严厉”与兄长的睿智。数年前我曾故地重游,在工作过的母校见到仍坚守岗位的老同事。除了部分成为领导的佼佼者外,绝大多数仍是“灰头土脸”和安于现状。

其实,权威就是信赖与无私。那篇去年8月的报载文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后。他为了完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现状”相关主旨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深入到了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他发现,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知识代言人”——底层学校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

作者李涛告诉读者,乡村学生认为,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这些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逻辑;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往往也会显得社会能力不足。因此,“这些孩子”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

这篇文章让我反复阅读,原因不仅仅是我曾经也与那些主人公类似,更多的是我认同作者对于中国教育条件“城乡二元化”与教育筛选机制“城乡同等化”之间矛盾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担忧。

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来农村学校里当老师”——这两段来自上述学生的评价,尤其令我感触深刻。

这些农村教师的权威,可以说已经低落到了极致。相关实情,他们本人或许并不完全知晓。如果他们的学校订阅了《中国青年报》,或者手机的无线信号足够稳定的话,现在这些教师应该也知道了学生对其的“真实评价”。

在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自然不用担心那些琐碎问题。教师的收入和地位,也足以支撑他们过上接近小康的生活。

与教师群体类似,大到央企集团,小到创业企业,他们的领导更需要树立权威。正如上面微博文字所说,学生一定程度上“爱学习”是因老师的“爱”而起。要让员工喜欢你,让他们愿意为了获得领导真诚的肯定和评价而努力工作。无疑,物质上的给予是重要基础,但是绝不可能孤立存在。没有足够权威的领导,其所在企业很难获得大成功,就是因为最宝贵的人”的资源,没有发挥出最大效率。

■寻宝 | Treasure Hunt |

## 冬日里的古玩城

孔伟

气温总算回升了一些,古玩城的人气却依旧清淡。周六、周日连续两天逛市场,发现即使前来转悠的藏友也大都兴致索然,商家更是生意惨淡,除了熟人见面时的几声招呼,连讨价还价的场面也见得少了。总体的感受是:藏品市场也如股市一般,正置身于熊市之中。

卖中高档货品的商家还好一点,虽不一定如传说中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卖出一件能够抵挡一段时间的消费及其他费用应该没啥问题;卖堆货的小老板就比较痛苦了,我认识的新疆大胡子玉商,周六一天下来只卖了400多元,第二天直到中午也才有200多元进账,从当天剩余的时间、古玩城的人流量和他摊上的货品来看,估计周末两天地摊的营业额合计不会超过1000元,不够他摆摊的摊位费,运输、餐饮、住宿更没着落,就别说什么利润了。寒风中他悄悄拉住我,很是神秘地“剧透”:下周六有新货,早点来!下午喝茶时将此消息告诉其他玉友,玉友们哄堂大笑;这大胡子,跟谁都这么说。看来,大胡子是逼急了。掐指一算,下周六不是快过年了吗,赴约的人恐怕比

这两天更少吧?

转到熟悉的湖北玉商摊上,所见仍然是一堆上不得台面的低档料子,其中还混杂了不少水石、卡瓦、大化石之类。之前的摊上总是人头攒动,如今也大都做“鸟兽散”了,长期以来“寄生”于她的原石摊的雕刻师傅也不见了踪影,估计眼见生意不好,提前回家过年了。摊主见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便热情地邀我去她店里看看,说是新到了一批黄口料手镯,黄度好,润度佳,价格也不高。黄口镯确实是近段时间市场上的热销品种,如果真如她所说,倒也值得一看。

店里确实有一些手镯,不过远不如老板描述的那么好,大概是室内光线不大好的缘故,这批黄口镯子看上去黄度很一般,却明显泛青。向守店的老板女儿打听,原来不过是几周前进来的老货,根本就不是什么一天前刚到深圳的新货。

这老板,几个意思?!再回到摊上,老板很是诧异:不会吧,一只也没看上?

我将她女儿的话如实转达。女老板一听就蹦起来了,很生气

的样子,赶紧打电话问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搞清楚了。原来,她女儿知道我砍价比较厉害,担心她抹不开面子,将手镯低价贱卖给我了。她觉得好东西就得卖好价钱,便宜卖出去了以后想买也买不回来。我回去好好教训她!”呵呵,这女儿,生意头脑绝对胜过母亲!

这么一折腾,再没心思买她家的手镯了。还是再去新疆玉商的原石摊上转悠转悠吧!

扒拉了几下堆货里的小料,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又翻了几块大料子,也没有“可口”的东西,就剩下把件料了。

一块半黄半黑的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大约300多克,看上去石性稍重,既像和田玉又像卡瓦石,不过入手分量十足,至少密度上没有问题。

原以为黑色部分应该是青花墨玉,但打光却又让人疑惑,黄皮部分进光还行,很黑的地方则大多数不进光,仅存的能够进光的地方呈现的却是绿色。如果是青花墨玉,进光应该是白色的,因为青花也好墨玉也罢,底子大都是白玉或青白玉,而白玉或青白玉打光自然是白色的。这料子,究竟是个什么鬼?!



冷冷清清的古玩城;捡漏的四色玉

孔伟/摄 翟超/制图

一帮玉友对这块料子展开了争论。有直接说是卡瓦石的,有号称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发现,掂量之后扔回去”的;有认为捡到宝了,这是一块黄皮青花墨玉+黑碧玉的组合体,再加上边上的那点白,属于罕见的四色玉,价值不可低估的;有直接开价求购的;要不,500元转给我?

捡漏在和和田玉原石中比较常

见,漏大漏小而已。我倒不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漏,但如果确实是和田玉,相比堆货价,翻几倍甚至过十倍应该没啥问题。

回到家里实测了一下密度,2.96,十分标准的和田玉的相对密度。看来,只要仔细淘,再便宜的料子中也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俺手里这块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财经书籍 | Business Book |

## 了解税收本源的路径

子栋

在2015年,中国政府减税频频,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2015年支持“双创”共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是深得民心的一项好政策。李克强总理曾深入阐释:减税降费,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实施精准减税,本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这也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去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多次强调“减税降费”,同时,将以往会议提到的“结构性减税”直接改为“实行减税政策”的表述方式,体现2016年工作中将把“减税降费”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说减税是中国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可以来看看李炜光教授的《国家的财税学》,手头的这本《国家的财税学》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在过去,对于纳税我并没有明晰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作为个人基本的义务。作为纳税人有哪些权利?纳税人如何行使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些基本问题,我却很少去思考,似乎在以往也很少有人引导此类的公众话题。

这本书首先抛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说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我国在税收问题上有什么明显的欠缺?纳税人应当拥有哪些基本权利?国家应该怎样征税,税收怎样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为什会议提到的“结构性减税”直接改为“实行减税政策”的表述方式,体现2016年工作中将把“减税降费”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李炜光在书中提出,在任何

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立、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关。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层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现实行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彻底革新。在书中提到,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失”,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法国大革命才会发生。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似乎显得更为严重。李炜光认为,中国在历史

上之所以出现治乱交替,陷入历史的“黄宗羲定律”中,就是因为无限政府和没有刹车装置的财税制度所致。自秦统一九州之后,中国就一直处于强大的皇权统治之下。而皇权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无限政府的形成,其最明显的外在特征是机构膨胀、官员冗多,这在经济上就必然要求有大量的财政经费以供其下佛谈,而中国自给自足的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却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但因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所建立的和以他为代表的政府也是“无限”的,这个政府所拥有的征税权也是“无限”的,于是,赋税、徭役征发便越征越多,越征越重,就像一辆因失控而狂奔不止的汽车,不到造成严重破坏的程度和受到外力的强力制止停不下来。赋税,于是便成为残害人民、破坏社会再生产能力、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的根本

因素。李炜光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当年法国大革命之前那些启蒙家,就是告诉人们一句话,你除了有纳税的义务,同时你还有质疑的权利。他说,等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社会的进步。中国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好多人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也开始问责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人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就是纳税人的意识觉醒,我交了税,就应该有问责的权利。

放眼2016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局2016年宏观调控政策时明确提出,2016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同样,供给侧改革的实践突破也绕不开“减税降费”的有力执行,要盘活中国经济这盘“大棋”,“减税降费”无疑将成为关键一步。